

宋太祖治国方略探究

史 清 周桃莲

(贵州大学 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宋太祖建立宋朝之后, 鉴于唐末、五代的经验教训, 决心革除弊端, 历精图治。其方略主要有 一、退功臣, 进文吏。二、严惩贪官污吏。三、安抚流民, 不加农田之赋。四、妥善处理与契丹和西夏等民族的关系。通过这些方略, 宋朝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

[关键词] 宋太祖 治国 方略

唐末、五代以来, 骄兵悍将专横跋扈, 严重危及王朝的统治, 官员严重贪赃枉法, 广大百姓流离失所, 这一切宋太祖都有切身体会, 因此在建立宋朝之后, 从维护宋王朝的长期统治出发, 他决心革除这些弊端。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不妥之处, 敬请方家指正。

一、退功臣, 进文吏

宋太祖依靠掌握的禁卫精兵, 夺取了后周的政权, 但封建军阀仍在各霸一方, 中央政府内部还受到军人制肘, 随时都有可能让历史重演。因此, 宋太祖决定剥夺功臣们的军权。建隆二年(961年)七月, 他与赵普的一段对话, 成为其加强皇权的行动纲领。在铲除李筠及李重进之后, 一日, 太祖召赵普问曰: “天下自唐季以来, 数十年间, 帝王凡易八姓, 战斗不息, 生民涂炭, 其故何也? 吾欲息天下之兵, 为国家长久之计, 其道何如? 普曰: 陛下之言及此, 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 方镇太重, 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 亦无他奇巧, 惟稍夺其权, 制其钱谷, 受其精兵, 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 上曰: “卿无复言, 吾已喻矣。”⁽¹⁾其后, 赵匡胤采用所谓“杯酒释兵权”的办法, 剥夺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一帮功臣的军权, 集军权于自己手中, 从而解除了来自军功大臣们的威胁。同时实行了用文官取代武将为地方最高长官的政策, 又分割地方官员的军权, 收归中央, 阻止了地方官员凭借武力割据。通过这些措施, 铲除了来自军队的威胁, 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宋王朝统治。

宋太祖在剥夺武将权力的同时, 任用大批士人充实官僚队伍。各级文官的物质待遇也很丰厚。王夫之对赵匡胤的知识分子政策作了客观的分析说他懂得“得士者昌”的道理实行的是“养士”的政策而不是“治士”的政策。⁽²⁾在选择士人进入官僚队伍中, 宋太祖非常重视人才选拔, 创立“殿试”, 亲自主持科举考试, 培养“天子门生”。如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二月下诏曰: “向者登科各级, 多为势家所取, 致塞孤寒之路, 甚基无谓也。令朕躬亲临时试, 以可否进退, 尽割畴昔之弊矣。”⁽³⁾又说: “贵家子弟, 惟知饮酒弹琵琶耳。安知民间疾苦?”因此下令: “凡以资荫出身者, 皆使之监当场务, 未得亲民。”⁽⁴⁾太祖不准资荫出身者直接做州县官, 这是对门阀势力的一种压抑, 也可看出他重视用人的努力。

宋太祖亲自选拔录用, 又显示及第人员, 都是“天子门生”。这就防止及第人员和主考官之间, 缔结成为集团, 形成一种政治力量, 危及君主统治, 使太祖成为至尊无上的偶像和崇拜者, 使中央政权机制运转处于正常, 减少不少麻烦。

二、严惩贪官污吏

宋太祖在重用文官的同时, 吸取以往贪官污吏横行枉法, 激起人民反抗, 导致失国的教训。以严法整饬吏治, 重

惩贪官污吏, 为宋王朝长期的统治奠定了基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1、“深恶赃吏”, 严惩贪吏。据《续资治通鉴》和《宋史》记载, 宋太祖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建隆元年始(960年)至开宝九年(976年)间, 惩处贪官污吏达40多人, 其中近二分之一被判处弃市之刑。这些人中既有朝中官吏, 如枢密院直学士、殿中侍御史、右赞善大夫等, 也有藩镇节度使、州官、县令等。如太子洗马王元告任英州知州一个多月, 接受许多贿赂, 于开宝四年(971年)被判处弃市之刑。又如建隆三年(962年)蔡河务纲官王训等四人, 因将糠麸泥土掺进军粮中, 被在街市处以石桀刑。这样的事例很多。这样做使贪官污吏们害怕, 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收敛。2、不容不贷“纵人为盗”、“政府不治”的渎职官吏。宋太祖一方面任命文臣京官为知县、知州, 扭转五代时期形成的军人控制州县的局面; 一方面加强司法权。设转运使以监司身份监察地方官员。对那些不负职责的官吏严惩不贷。如建隆二年(961年)宫内酒坊失火。酒坊同三司房屋相接, 火灾发生的晚上, 工匠徒役闯入三司官署盗窃官府器物。宋太祖因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放纵工匠役徒进行盗窃, 斩杀工匠役徒38人, 左、田二人亦被处以弃市之刑。3、重罚“不能举察”、“失于弹劾”的治吏之吏。宋太祖治吏的另一个显着特点, 是以具有弹劾、举报之职的官吏坐失于职的, 都严加处罚直至消除官籍, 以促使他们认真履行纠举监督之职责。商河县令李徯犯贪污罪受杖刑而死。左赞善大夫审文纬奉命出使检查田亩, 未能发现李之脏罪而举报。被宋太祖削除官籍。4、“躬履俭约”言教和身教并举, 促使官吏廉洁谨慎。宋太祖出身布衣, 拔于行伍, 久于征战, 显贵后不忘过去, 俭朴节约, 身体力行, 经常穿洗了又洗的衣服, 车马用具都崇尚质朴素雅, 卧室里挂着用青布缝边的芦苇帘子, 宫殿内庭的帐幕, 没有花纹彩绘的装饰。他还经常拿出麻布衣衫赐给左右近臣说: “此吾旧所服用也”。官吏孟昶使用器皿奢侈过度, 甚至连溺便器皿也用七宝来装饰, 宋太祖马上命令击碎它, 说 “奉养自己到如此程度, 要想不忘国, 可能吗?”⁽⁵⁾正因宋太祖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 一时间好官廉吏辈出, 前朝留任宰相范质、御史中丞刘温叟等人就是杰出的代表。

三、安抚流民、不加农田之赋

北宋初期, 经过数十年的战争破坏和天灾人祸, 给广大百姓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天下户民, 大半家贫产薄, 征赋之外, 差配尤繁”⁽⁶⁾。面临着土地大量荒芜、失业农民到处都是的严重局面。五代末年窦俨就说: “今编户之氓, 以债成俗, 赋税之外, 罄不偿债。收获才毕, 率无困仓”。⁽⁷⁾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太祖一向重视历史的教训, 离他出生只有40多年的黄巢起义, 就是利用农民失业, 离开土地, 进行“滚雪球”式的战斗, 队伍越来越大, 最终打入长安, 严重动摇了李唐政权的

统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太祖就“流民”问题，采取了如下做法。其一，“遣使均括诸州民田，申明周显德三年之令。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为差，桑枣半之；男女10岁以上，种韭一畦，阔一步，长十步；乏井者，邻伍为凿之；令、佐春秋巡视，书其数，秩满，第其课为殿最。又诏所在长吏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只输旧租；县令、佐能招徕劝课，致户口增羨、野无旷土者，议赏。诸州各随风土所宜，量地广狭，土壤瘠确不宜种艺者，不须责课。遇丰岁，则谕民谨盖藏，节费用，以备不虞。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⑧其二，“招抚流民，平均赋役。建隆二年闰三月，“诏自今民有逃亡者，本州县具户籍顷田以闻，即检视之，勿使亲邻代输其租。”^⑨仍然保持流亡农户的田亩数，等待失业农户的再就业；且“勿使亲邻代输其租”，不使土地所有权转让给他人。干德四年，针对五代以来，常检视见垦田以定岁租，吏缘为奸，税不均适。由是百姓失业，田多荒芜的状况。太祖下诏禁止。“许民辟土，州县不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⑩太祖还更定税制，把两税的征收时间确定下来，根据地理条件的差异，田蚕成熟的早晚，做出具体规定，^⑪使赋役趋向均平合理，阶级矛盾获得了缓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在日益增强，政府的法令权威在日益增强，政府的法令权威也在加强。其三，从失业流民中挑选军卒。太祖军队的来源，出自召募，成为加强中央权威的内容之一。宋初召募得对象，约有四种：一是召募饥民在当地补充；二是召募人民就地编制；三是收编本军士兵子弟；四是将犯罪囚徒配隶给役。招募饥民当兵，被太祖看作维护政权的重要手段，并且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成为赵宋统治集团的传统政策。这样，太祖实行的募兵制度，又成为它制止人民反抗的工具。每当凶岁饥年，政府便乘机召募流民饥民入伍，这样使阶级矛盾得到缓和，“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为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也。”^⑫将流民“各安田里”，不敢流动转移，这对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制止农民反抗，保证社会秩序稳定，带来很大好处，值得后人借鉴。

四、妥善处理与契丹和西夏等民族的关系

我国历史上，由于中央政府没有中确处理好周邻，民族和版图内的民族关系，先后出现过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地和唐末五代民族战争。长期的战乱，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破坏。这种状况几乎一直延续到宋初。太祖亲身经历了这场残酷的民族战争，深感这场战争的灾难。因此，他当上皇帝后，在民族关系的态度上，基本上是采取调整、和缓、利用的方针。

1、对待北方的契丹族政权，采取平衡的守势态度。五代是历史上民族战争严重时期之一。当时中央政权主要的威胁来自北方。北方各民族里，以契丹最为强大。中原皇朝的统治阶级，为了更好的统治，往往和外来民族的贵族集团相勾结，甚至为争权夺利，勾结另一族的统治阶级，假借他们的力量，来扩张自己的实力。这样一来，就给外来民族的贵族集团尤其是契丹贵族集团产生南下的野心。但太祖建立北宋，筹划他的统一政策时，他有二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趁契丹族在耶律述律的腐朽统治下，利用周世宗的成果，打垮契丹族在幽、云州的势力，割断北汉与契丹的联系，然后合并北汉。一是采取先南后北的策略，不与契丹政权发生冲突，攻取南方割据政权后，再和契丹打交道。最后太祖听纳了赵普的意见，在两者之间，权衡利弊得失，终于选择了先南后北的道路。根据这个策略，太祖对北方契丹政权采取了防御的守势，着重在“保境息民，不欲生事”八个字。太祖采取的这一策略是正确的。首先，契丹统治者耶律述律，生活腐化堕落，契丹在他的统治下，内部矛盾迭起，统治力量正在不断削弱。其次，北汉政权虽有契丹保护，但契丹对北汉的

残酷榨取也是十分厉害的，激起北汉人民的不满，北汉与契丹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再次，赵宋内部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取得一定程度上的缓和，赵宋的统一事业，体现出汉族人民渴望和平统一的意志，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第四，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却非常复杂尖锐。其中有赵宋和后周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中央政权和各封建割据政权之间的矛盾；最高皇权和藩镇军阀势力派之间的矛盾；皇权和功臣之间的矛盾等。这些问题如不先行解决，便直接威胁中央的权威，直接威胁赵宋王朝的生存。最后，赵松的军事力量与契丹相比较，未必占优势地位。太祖在后周时期，参与柴荣发动的几次重要战争，对契丹的实力有一定的认识。柴荣虽然受复关南，事实上是“王师数万，不亡一矢，边界城邑，皆望风而下”。^⑬取胜原因在于守城汉将投降，而不是军事上的胜利。契丹的军事力量依然强大。“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⑭证明契丹的社会经济也处在上升阶段，国力充裕。因此，基于以上五方面认识，太祖在对契丹族政权的态度上，采取守势自有他的原因。其实行结果，使得大后方安稳平静，无北顾之忧，能够集中力量统一各个封建割据政权，对于北宋统一国家的重建，进一步加强中央权威，使各民族百姓向汉族为主的中央政府靠拢，有着积极意义。

2、对待西北党项羌政权的态度。历代内地王朝对夏州地区长期以来采用的是羁縻政策，后唐明宗诏书说：“夏银绥等有州，最居边远，久属乱离，少识朝廷之命”。^⑮太祖承袭这一政策。他对西夏民族政权，一方面增强西北边疆的防御，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生、冯继业等将官，严密据守；一方面则争取建立和平关系，来确保边疆环境的稳定。太祖罢除藩镇大权，可说是不遗余力的；但对五代以来，就领定难节度使的李彝兴，不特始终将他保存，而且对这个党项族首领，采取了极尽“羁縻”之能事的手段。太祖在位期间，宋与西夏的关系是和好的。当宋军与北汉发生战争时，彝兴都给宋以军事援助。其子李光睿曾破关堡寨，斩首七百级，获牛羊以千计。^⑯一旦有封建军阀出兵劫掠羌族羊马，太祖恐怕惹起反抗，必将他们内调，另派他人充当，“悉心绥抚，夷落安静”。^⑰

3、对待土蕃族的态度。太祖采取让步绥抚政策。自唐末以来，土蕃王朝发生分裂，一部分散居我国青、甘、陕一带。依接近汉族州县者，又有生、熟户之分。宋琪说：“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其帐族有生户、熟户；接近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过寇掠者，谓之生户”。^⑱宋初，秦州附近一带，居住着众多吐蕃族的人民即生、熟户。正如《长编》卷三《太祖建隆三年六月》条所载：秦州夕阳镇，古伏羌县之地也，西北接大藪，材植所出，戎人久擅其利，及尚书左丞高防知秦州，因建议置采造务，辟地数百里，筑堡据要害，戍卒300人，自谓而北则属诸戎，自谓而南则谓为吾有，岁获大木万本，以给京师。于是西戎酋长尚巴约率众来争，颇杀伤戍卒，防出兵与战，捕系其党40余人以闻。上不欲边境生事，癸巳，以枢密使吴廷祚为雄武节度使往代防。显然，太祖对高防与吐蕃族互争木材，而造成吐蕃族人民的不满，杀伤士卒，侵扰边地的做法是十分反对的。他出于边境地区的稳定考虑，不得不拆换高防，停罢了采造务，并以枢密使吴廷祚出知秦州。太祖对吐蕃民族的绥抚政策是收到一定的社会效果，酋长尚巴约得到太祖的宽恕，更增加了太祖在吐蕃民族中的崇高威望。

4、对西南少说民族的态度。太祖既下荆、湖割据政权，即派出“通蛮情、习险厄、勇智可用者以镇抚之”。^⑲有辰州瑶人秦再雄者，长七尺，武健多谋，在周行逢割据政权中，屡以战斗力功，蛮党伏之。“太祖召至阙下，察其可用，擢辰州刺史”，官其子为殿直，赐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属，予一州租赋。再雄感恩，誓死报效。“至州日训练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历山飞堑，捷如猿猱”。又亲选校20人分使诸蛮，“以传朝廷怀来之意，莫不从风而靡，各得降表以闻”。太祖

《北游录》的写作原因及史料价值浅析

张鹏飞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50)

【摘要】《北游录》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史学家谈迁留给后人的一部著作，此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记事详实且真实可信。书中详细记录了谈迁写《国榷》这部史学巨著时到北方收集史料的经验，记载的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其它史料所不及。所以，《北游录》是研究《国榷》这部史学巨著必不可少的资料；也为研究谈迁本人的生平及经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因此，《北游录》及其史料价值就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

【关键词】《北游录》 写作原因 史料价值

《北游录》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史学家谈迁留给后人的一部著作。谈迁因以其毕生精力撰成《国榷》这部史学巨著而为世人所知。学界对谈迁及《国榷》研究颇多，而对《北游录》一书却关注不多，鲜见研究。《北游录》一书详细记录了谈迁写《国榷》这部史学巨著时到北方收集史料的经验，记载的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因而更加真实可信，为其它史料所不及。所以，《北游录》是研究《国榷》这部史学巨著的必不可少的史料；也为研究谈迁本人的生平及经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因此，《北游录》及其史料价值就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

别居停，竟长揖出门，不更求他犒。道中蹶一敝屣，殆于决踵。余岂不忧日后耶，忧日后又不忍目前。”^[4]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谈迁性格耿直，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

谈迁年轻时像当时的其它读书人一样，也曾有过热切的仕进之心，希望自己对明朝政权有所作为，使他们无法参与国家政治。^[5]他在《北游录·纪文》中愤慨地指出：“去古昔日以远，独场屋之文，盛行于世。竖子胜衣以上，或脱颖登籍，即本其场屋，稍易句格，曰此古文词也。士群而趋之，余所见往往也。”

二

《北游录》是记述谈迁于顺治十年癸巳（1653年）到顺治十三年丙甲（1656年）这两年半在北京期间的经历见闻和他写的一些诗文。全书共九卷：纪程、纪邮、纪咏、纪闻各二卷，纪文一卷。从这些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爱国史学家为了完成他的史着《国榷》在搜集史料、考订史实的过程中是怎样不避艰苦、辛勤工作；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个明朝的亡国遗民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

谈迁写《北游录》的原因很简单：为了完成他的史着《国榷》而搜集史料、记录他的见闻感受并寄托他的思想。谈迁“生平无他好。”^[11]他在《国榷·自序并凡例》中指出官修明史的种种弊端，综其大者，约有以下几点：一、史无专职、专属；二、史为权贵者所垄断；三、史书直言遭忌。书凡百余种。^[14]明天启六年（1626年）初稿撰成后，谈迁继续搜集史料，对原稿进行不断的修改和补充。不料，明朝灭亡之后，《国榷》原稿被窃。此时已53岁的谈迁在“拊膺流涕”后，愤然站起，

谈迁是我国17世纪的伟大爱国史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以后更名为迁，字孺木，自署“江左遗民”，海宁县枣林人，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宋朝灭亡时，谈迁的祖先为避兵灾搬到海宁居住，他在《枣林杂俎》中说：“吾上世……德佑末避兵徙盐官之枣林。”他出生于一个耕读传家的小地主家庭，万历以后，家产数次被“旧勋”大户侵夺霸占，加上连年荒歉，家境急剧跌落，到明朝灭亡时，谈迁几乎一贫如洗了，为了一家的生计，他多年受雇于人，在官僚地主门下驱使。^[3]据《海宁县志》记载：“（谈迁）处士操行廉，虽游大人先生之门，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四壁。”由此可见，谈迁的生活境况是不大好的。虽然如此，谈迁仍然坚持操守，不肯改变，《北游录·纪邮》中就记载他好几次拒绝别人送给他礼物，拒绝别人拿钱买他的文章；即使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南归时也不肯求人写介绍信以取得方便。他说：“在燕时，或修贄广谒，而余不能也。

大喜，复召至阙，而加奖励，改辰州团练使。秦再雄尽瘁边圉，“五州连袤数千里，不增一兵，不费帑庾，终太祖世，边境无患”。^②太祖认为对西南边境的各族人民，都应当“敦信保境”，曾下诏：“沿边诸州，禁民无得出塞侵盗，前所盗马，尽令还之。”^{〔21〕}这样边境上无谓的民族冲突和各族入境侵扰的机会自然大大减少了，反映了中央政府执行民族政策的正确，提高了太祖皇权的至尊威严。

综上所述，宋太祖主要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措施，使刚建立起来的北宋王朝的统治初步稳定下来，为宋王朝以后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 (1) 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 北京：中华书局。
- (2) 《宋论》。
- (3) (9) (10) (17) (21) 《长编》卷18、2、7、10、3。
- (4) 宋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58《选举志》
- (5) 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 北京：中华书局。
- (6) 宋 王欣若等《册府元龟》卷547《谏诤》。北京：中

华书局。

(7) 《全唐文》卷867。

(8) 《宋史》卷173《食货志》、《太平治迹统类》卷2。 北京：中华书局。

(11) 《宋史》卷174《食货志》。

(12) 朱弁：《曲洧旧闻》卷九。

(13) 《旧五代史》卷119《世宗纪》

(14) 《辽史》卷60《食货志》

(15) 宋 王欣若等《册府元龟》卷196

(16) (18) (19) (20) 《宋史》卷485《西夏传》、卷264《宋琪传》、卷493《蛮夷传》、卷493《蛮夷传》。

作者简介：

史清（1966-）男 安徽安庆人 贵州大学2005级专门史硕士研究生。方向：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周桃莲（1978-）女 安徽安庆人 贵州大学马列部2006级硕士研究生。方向：思想政治教育。